

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刘永涛

内容提要:80年代中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对以实证和经验方法获得的国际政治知识进行彻底清算和批判性的重建。在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变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试图打破现存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它的兴起和挑战给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注入了活力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刘永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200433)

80年代中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中,其主要特征是对以实证和经验方法获得的国际政治知识进行彻底清算和批判性的重建。有人把这个转型过程称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争论”。然而,不同于先前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历史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的交锋,这场“争论”似乎没有明确的辩论方,它是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频繁对话。这场“争论”的内容也不同于前两次,它主要围绕元理论或理论本身问题而展开。批评者们怀疑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主要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描述、解释、规定或预测国际政治方面发挥的作用,提出从理论上探讨该学科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的哲学问题,其目的是寻找获得更好理论的途径。在这一学术思想的转

型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变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实证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凭经验、观察和实验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的实证或经验方法,是一种最初被用

吉姆·乔治:《全球政治话语:批判性的国际关系(新)导论》,博尔德、林恩·里讷出版社1994年版;弗雷德·哈利迪:《重新思考国际关系》,巴斯廷斯托克,麦克米兰出版社1994年版;马克·诺伊菲尔德:《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约瑟夫·拉皮德:“第三次争论:后实证主义时代国际理论的前景”,《国际研究季刊》1989年(33),第235-254页。如果把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视为第三次的話,那么,这次“争论”要算作第四次。

于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到了19世纪初,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首次提出利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世界、发现社会规律的观点,与当时产业革命的兴起相呼应。他把人类知识划分为3类:神学知识、玄学知识和实证知识,使它们与人类智力及社会发展经过原始、中间、科学3个阶段相对应,说明实证知识标志着人类进入科学阶段。孔德的实证主义取向提出方法论上的统一科学概念,这一概念大体包含了3个基本方面:第一,实证的知识是真实的,因为它符合经验上的事实;第二,实证的知识是客观的,因为它对事实的掌握是在没有受到主观因素歪曲的情况下获得的;第三,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具有统一性,即它不但适用于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也适用于对社会世界的研究。换言之,同自然世界一样,社会世界也存在着法则或规律,社会研究者的任务是通过观察、实证和经验的方法去“发现”它们。然而,孔德的观点存在不足,甚至存在某些内在矛盾。出于这种理由,20世纪20年代,实证主义的另一种新变体——逻辑实证主义——在奥地利、德国和波兰出现并迅速占据了支配地位。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经验证实原则”,强调使用科学的、直接或间接地被经验证实为有意义的语言,反对使用无含义的、规范性的话语,不研究超越可被观察、被实证和经验以外的东西。他们还注重解释经验领域内发生的事件,并对它们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进行预测,从而提出演绎——推理解释模式和前提——演绎理论发展研究模式等。应该承认,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成为指导不少社会学科领域——包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

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从外交史、

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研究传统是注重和强调国际事件及人物的特殊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和独特性。它所关心的不是发现普遍法则,而是注重叙述具体的外交事件、人物或决策过程,再现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面貌。然而,在学科建设的进程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并没有沿着叙述的传统发展,而是逐渐从叙述转向接受实证主义传统。从历史看,实证主义传统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结合大体经历了4次。

第一次是在本世纪20至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欧美国家确立。在当时,它主要关心从理论上回答爆发战争的原因和维持和平的手段问题。残酷的大战促使人们对战争的整体现象进行系统研究,摆脱对个别的、孤立的战争案例进行叙述的传统作法。此外,人们还试图对国际组织、国际法等维护国际和平方面的作用给予较系统的说明。这些均为后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综合性、一般性理论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是在40至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国联的破产以及国际乌托邦理想的破灭。1939年,英国学者爱·H·卡尔出版了《二十年的危机》一书,批评自由主义的幼稚观点。此后,政治现实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194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的《国家之间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9、417-440页;马克·诺伊菲尔德:《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8页。

次数的划分参考了尼克·伦格和马克·霍夫曼的论文“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国际关系”,载乔·多尔蒂、埃尔斯佩斯·格雷厄姆和莫·马赖克编:《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47页。

的政治》一书问世,被推为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经典著作。该书继续探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其实证主义色彩更为浓厚,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本最早尝试建筑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国际政治理论框架的专著;第二,该书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有一套客观法则在调节和控制着国家行为,作者指出,“关于政治上的事情,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普遍有效的真理,……(它)是人的理性所能够获得的。”这种认识论一直反映在后来的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

第三次是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当时的行为主义革命渗透到西方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挑起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主义与行为主义之间的激烈论战。行为主义利用现代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批评传统的国际政治知识不是“根据科学”,而是“凭直觉”总结出来的,并且把“事实”与“价值”混淆在一起,因此是不精确的和缺乏事实证明的;认为历史研究所使用的大量书籍、文件、档案资料等只是直观地积累事实或收集知识。一些行为主义者试图建立所谓定量型国际政治知识,其目的是要通过“真实的”数据来“精确地”分析和预测国际政治、检验理论假设。在这场关于方法论的争论中,行为主义的“科学”及实证方法居上风,但传统历史主义使用的概念、术语和基本理论假设亦得到了保存。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 1962 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轰动了当时的西方思想界。该书探索了理论范式的本质和变化,试图打破“科学”这一概念,认为没有什么“客观”知识是独立于观察者的价值、信仰和偏爱之外的。这种观点显然与当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强调实证方法的苦心经营相对立。这一时期,以国际两极体系为特征的冷战正在经历一

些变化。在这种理论和现实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一些人找到了向正统国际关系理论发出挑战的机会,结果出现了多元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理论范式,试图与占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并存。它们各自强调不同的行为体、概念、问题和价值。然而,“范式”概念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滥用、误用、错用等现象,反过来巩固并突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义的阵营。

第四次是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1979 年肯尼思·华尔兹出版了新现实主义代表著作《国际政治理论》,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再次使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得到“拨乱反正”。作者开始以整篇章节讨论科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问题,然后在批评先前理论“缺乏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他所谓“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华尔兹通过对国际关系史的观察发现,“国际政治的特征处于高度稳定的状态中,其模式一再出现,事件本身反复不断。”他试图从国际体系层面分析、解释和预测国家之间的行为及其结果。新现实主义成为过去近 20 年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占统治

汉斯·摩根索:《国际之间的政治》,纽约:艾尔弗雷德·克诺夫,1973 年版,第 11 页。

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伊利诺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0 年扩大版。库恩讨论了理论范式问题,把“范式”定义为“一方面它代表某个特定团体成员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巧等的总汇;另一方面,它指这一总汇中的一种要素,即作为模式或范例使用的具体解疑方法,这种解疑方法可以替代明确的规则,作为解决常规科学其余难题的基础。”(第 175 页)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间的争论,可参阅 M. 班克斯:“范式间的争论”,载 M. 赖特和 A. J. R. 格鲁姆编:《国际关系理论:当代理论手册》,伦敦,弗朗西斯和泰勒 1985 年版,第 7 - 26 页。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66 页。

地位的取向。

然而,自 80 年代中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新现实主义不断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尤其受到来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猛烈挑战。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广义概念,泛指一批思想和一类情感,最初渗透于西方文学批评、艺术、建筑、绘画、广告等领域。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主要出现于 60 年代后期的法国,代表人物有福柯、拉康、巴尔特、里奥塔、德里达、克里斯特瓦、德鲁兹、布德里拉尔等。他们的思想前辈则有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欧和美国——尤其在知识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90 年代以来,它再次显出非常的活力和气势,对西方社会科学领域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总特点是打碎旧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冲破现代主义确立起来的条条框框、反对实证和经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反对关于理性是决定因素的说法。然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作出确切而全面的描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此,本文只阐述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关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主要包括实证主义的批判、文本和作者关系、知识和权力关系、解构与延异等。

后现代主义对建立在实证或西方逻辑基础上的一切理论及其方法提出质疑,不赞同所谓在社会世界存在普遍的、基本的法则的说法,认为实证主义的简约化做法否定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后现代主义不承认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具有优势,认为每种研究方法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彼此是平等的,指出实证的归纳演绎方法

涉及到评判,因此也是武断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排他性的东西,譬如西方二元对立世界里的客体/主体、自然/文化、物质/精神、男性/女性、言语/写作等等。一方面(前者)被认为是为核心的,另一方面(后者)则被忽视,整个西方思想是建立在核心观念基础之上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要颠倒这种情形,解放和关怀被现代主流搁置一边的偶然事件、边缘问题、不联贯或被忽视的问题、被压抑和忘却的问题,提出重新讨论被正统或主流不以为然或理所当然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强调文本研究,指出整个世界乃是一个文本:人生经历、政治集合、民众选举、缔约谈判等等。所有文本都具有多种含义,它们不是固有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通过“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体现出来。后现代主义提倡对文本进行解释而不是发现文本;强调阅读而不是观察。文本本身应该是开放性的,人们可以对它作无数的解释。文本每次被阅读后都应该得到重写或重新解释。在阅读过程中,文本作者“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文本独立于作者的特殊环境与个性之外,人们在阅读和解释文本时,不必去参考文本原作者的因素,诸如作者会如何解释文本、作者生平及写作背景、动机或意图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激进地认为,作者所写的东

大卫·科尔布:《后现代的复杂性:哲学、建筑学与传统》,伊利诺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 - 5 页。

吉姆·鲍威尔:《德里达研究入门》,伦敦,作家与读者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 - 59 页。

罗兰·巴尔特:“从作品到文本”,载约苏·哈赖编:《文本战略:后结构主义批评视角》,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7 页。

西并非作者本人所想表达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强调话语——广义上指语言、含义、符号、认同、交往形式等——在社会及权力组成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而对目标、选择、行为、态度、个性等问题不感兴趣。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不仅是由概念构成的,而且是建立在人类大脑语言基础之上的东西,语言不反映“现实”,只不过是创造和再制作出一个世界罢了。按照德里达的观点,人们只是在通过概念、代码和范畴等去接近“现实”。被建构起来的世界是一个不明晰的、处于不断变化的世界。因此,后现代主义不承认真理的可能性,认为真理和知识乃是权力垄断、优势特权的结果,并体现和服务于权力支配者的利益。

在方法论方面,后现代主义强调内在反省、多元解释、解构和延异。后现代主义反对实证主义所采用的数据采集分析、模式设计、抽样研究等方法,不依赖“理性”或“逻辑”分析,不承认也不谋求揭示一个独立于主观以外的“客观”现实,而是依靠直觉、感觉、见识、本能等去解释文本,认为没有什么“最好的解释”,所有的解释都同样具有意义。一个多元的世界需要有多元的解释。“解构”和“延异”是后现代主义的两个重要术语。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来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摧毁”(destruktion)概念,意思是通过揭示本体内在发展来打破本体论关于研究终极本质现实的古老传统。现在,它经常指一种阅读方法:首先,它关注一个文本里的二元对立物,譬如男人/女人;然后,说明这组对立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为何一方处于核心的、有利的和自然的地位,另一方处于被忽视、被压抑和边缘的地位;再后,它打破和颠倒这种等级偏见状态,造成文本的含义与其当初的含义相反;最后,它使二元双方处于无等级、平等的状态中。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重要术语是延异(difference)。

该词具有双重含义:“差异”(differ)和“拖延”(delay)。前者意指“不同于别的东西”,后者指“推迟至以后”。我们可以通过瑞士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一个命题来理解这一术语。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互相依存的语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语词的确切含义都仅是与其它语词相互依存的结果。”也就是说,词语制造出含义是因为它们是某种差异体系中的诸成分。

三、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与挑战

后现代主义思潮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进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目前有诸多迹象表明,它来势凶猛,强劲有力。譬如在美国,一些大学已经为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开设了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课程,一些大学成为这类研究中引入注目的重镇,更多的知名出版社和国际问题学术杂志开始出版和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少年轻学者或“新一代”研究者热衷于把后现代主义思

参阅罗兰·巴尔特:“作者的死亡”,和“作家、知识分子、教师”,载罗兰·巴尔特编:《意象、音乐、文本》,纽约,希尔和王出版社 1977 年版;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载约苏·哈赖编:《文本战略:后结构主义批评视角》,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雅克·德里达:《论写作学》,G·斯皮瓦克译,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

吉姆·鲍威尔:《德里达研究入门》,伦敦,作家与读者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 - 31 页。

该术语借用刘放桐教授论文中的译法。刘放桐:“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国外社会科学》1996 年,第 3、4 期。

弗尔特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07 - 608 页。

弗雷德·哈利迪:《重新思考国际关系》,巴斯廷斯托克,麦克米兰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 页。

想和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研究。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否定目前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错综复杂的世界事务进行实证和经验上的认识。它的理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社会,人作为行为主体,不同于化学元素或物理颗粒。前者有思想、观念、价值、伦理道德等,后者则没有。因此,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不完全适用于研究社会世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从自身的本体论和意识形态出发,只是看到国际关系中的特定画面,在理论和认识论上存在局限性和狭隘性,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它们总结或获得的国际关系知识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反对实证的主流理论把复杂的、处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僵化而单一地简化成几条“普遍法则”来表示,提倡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多元化,多角度、多视野地解释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者意识到,当代国际关系领域正在经历新的剧烈变化,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发展已落后于现当代的诸现实”。因此,他们呼吁在深刻反省基础上重建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广泛而庞杂的综合体,并不是指某个整体或统一的学派。目前较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4个分支力量:

1、批评的社会理论分支。这一理论主要受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社会学观点的影响,也受到尼采、吉登斯和福柯等人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考克斯、马克·霍夫曼、安德鲁·林克莱特、亚力山大·温特等。这一派学者主要提倡从社会学观点解释国际关系。在本体论上,他们不赞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关于人性及行为的概念,认为世界政治和现实的存在不是理所当然的,

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人的信仰和行为选择的产物。他们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主要反映西方意识形态和利益,为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及防务政策服务。在方法论上,他们反对单一研究方法占据霸权地位,强调多样的学术范式以及理论解释的多元化尝试。在认识论上,他们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实证和经验方法获得的国际政治知识表示质疑,不抱任何企图去发现和总结世界政治的普遍及客观规律,而认为国际关系如同所有其他文本一样,它的含义处于不断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变化中。在价值论方面,他们强调恢复研究国际伦理的重要性,指出文化、规范和认同等社会因素在调整国家之间行为及利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是国际体系中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对国家行为及利益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他们还提倡通过研究社会运动和力量、公民社会、世界秩序等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变化。

安·蒂克纳:“前言”,载V·斯派克·彼得森编:《性别化的政体: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新)视野》,博尔德,林恩·里纳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参阅下列社会批评理论的主要作品: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千年间:国际研究杂志》,1981年,(10)2,第126-55页;《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创造世界中的社会力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马克·霍夫曼:“批评理论和范式之间的争论”,《千年间:国际研究杂志》,1987年,(16)2,第231-49页;安德鲁·林克莱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与公民》,巴斯廷斯托克,麦克米兰出版社1982年版;《超越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国际关系》,巴斯廷斯托克,麦克米兰出版社1990年版;“国际关系理论的下一个阶段问题:一种批评理论的观点”,《千年间:国际研究杂志》,1992年,(21)1,第77-99页;亚力山大·温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为者——结构难题”,《国际组织》,1987年,41(3),第335-70页;“无政府状态由国家所制造: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国际组织》,1992年,46(2),第392-425页。

2、历史社会学派分支。这一派思想把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一些研究者强调研究国家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国家形态的变化,认为民族国家、文化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指出国家是内在力量和外界环境之间互动的产物。这样,从根本上打破政治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不重视文化因素研究的作法,以及单凭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假设。

3、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作品分支。国际关系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男人的领域,战争中的将军和士兵、政治家、决策者、外交官等大都由男人充当,国际关系似乎使“女人走开”。然而,自1988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刊物《千年间:国际研究杂志》出版了题为“妇女与国际关系”的专集后,一直受到压抑和忽视的女性观点和声音开始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发出日益明显和激烈的挑战。这一分支的主要代表作品有:V·斯派克·彼得森编的《性别化的政体: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新)视野》(1992年)、安·蒂克纳的《国际关系中的性别:从女性视角看实现全球安全》(1992年)、斯派克·彼得森和安·西森·鲁尼恩的《全球性别问题:世界政治中的困境》(1993年)、克里斯廷·西尔维斯特的《后实证主义时代的女性理论及国际关系》(1994年)等。总体上,这些作品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性别偏见”特征提出了批评,探索了世界政治及国际安全中长期被忽视的妇女地位及作用问题,以便达到把“性别话题引入国际关系学科”的目的。它们的主要观点有:妇女传统上扮演的母亲和照顾者的角色,使她们在国际关系中更趋于成为合作与和平的使者;国际关系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现象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需要打破;迄今为止,主要由西方白种男性创造出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是有偏

见的、不全面的,因为它们既没有给予妇女问题充分的地位,也没有体现妇女的观点和声音。这一分支内部尽管存在不同变体,但是整体力量正在壮大。

4、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重读派分支。它的思想比较激进,试图全面否定和推翻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设。它重视后现代主义强调的“话语”作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关注对国际关系文本本身及含义进行重建,认为含义是语言建构起来的。在国际关系方面,它提出,只有少数人直接参与和经历了国际事件和对外决策活动,绝大多数人则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教科书、电影、小说等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及国家对外政策方针。这种通过操纵符号来建构国际关系含义的情形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所忽视。这一分支的研究者提供重新解释国际关系文本,他们重读的内容主要有政治及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理论(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摩根索、华尔兹等)、国际关系重要概念(无政府状态、结构、权力、利益、主权等)、国际关系研究主题(国家对外政策、战略及安全、外交等)。阅读的基本作法是分解所有核心文本,使它们支离破碎,然后对它们进行重读,给予新的解释,或者从中揭示它们的毛病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最终打破文本的

查尔斯·蒂利:《恐吓、资本和欧洲政体,公元990-1990年》,牛津,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0年版;米歇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卷1,1986年,卷2,1993年版;西达·斯科克波尔:《政体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核心成分,突出被忽视或压抑的含义。

四、基本评语

本文认为,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为开拓和深化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至少作出了以下两个较有价值的贡献。

一个贡献是,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揭示了西方国际政治知识与西方权力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具有的“霸权地位”及深险性和偏见性。我国研究者在 80 年代后期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这种关系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譬如强权政治理论、国际机制理论,不但是根据西方意识形态、根据对欧洲历史及经历的观察产生出来的,而且是直接为西方国家对外及防务政策服务的。譬如,一些新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两极化对世界安全所起的稳定作用,并以冷战时期处于“相对长期和平”为例证。然而,这种认识显然只考虑了冷战时期欧洲的相对和平。众所周知,冷战时期亚洲和其他地区一直处于局部战争和冲突之中。当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思想是由强权国家提出的,它指导着强权国家的对外关系。这种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强权“国家”的对外关系理论。或者说,人们更易于看到的是局部的或代表某些强国利益的理论,而不是什么普遍的、“国际”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也应积极参与理论方面的研究,与西方理论相互充实。

另一个贡献是,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重视扩大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如果说一定的理论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并反映那个时代,那么,二战以后西方国际政治主流理论强调对权力、利益、结盟、威慑、均势等的研究,反映了当时超级大国之间冷战的需

要。后冷战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已经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需要人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研究课题,以解答新的现实挑战,探讨长期被压抑和忽视的问题,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修正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使其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具有解释力的同时,应总结后冷战时期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在开拓视野方面,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从现存主流理论强调以实证数据为主的国际行为模式研究,转向对国际关系文本含义结构以及国家所处社会结构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强调作为外界物质的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重视国际关系结构中物质力量的分配。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则把文化、社会、规范、认同等被认为属于国内政治研究范畴的诸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用它们解释国际行为及其后果。这种从研究“外部”转向研究“内部”的方法,不仅利用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是对传统研究取向的一种回归和复兴。

然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首先,后现代主义对现存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给予了广泛的批评和否定,但是,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并未建立一个明确的后现代国际关系知识

参阅下列主要作品:R. B. J. 沃克:《内部/外部: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戴尔·德里安:《反外交:间谍、恐怖、速度和战争》,牛津,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1992 年版;大卫·坎贝尔:《书写安全:美国对外政策及本体政治》,双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大卫·坎贝尔:《没有原则的政治:主权、伦理和对海湾战争的叙述》,博尔德,林恩·里讷出版社 1993 年版。

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2 - 83 页。

系。其次,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既然反对实证和经验的主流理论压抑了“其他”思维和声音,倡导理论范式的多样性,那么,它们为什么不给实证的国际关系理论一席之地,而要竭力打破它们呢?如果在打破主流理论垄断之后出现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垄断,那是不符合后现代主义最初宗旨的。第三,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似乎过于强调主要适用于研究文学及社会学的方法,过多地将话语、文本、建构、认同等概念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科有其自身特点,毕竟不等同于文学批评或其他人文或社会学科。我们不能将研究国际关系等同于研究话语和文本。第四,西方国际关系学科面临着—个研究范围定位的问题。如果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关心的问题过于宽泛、过于追求研究的新颖和奇异,那么,它将给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带来某种程度的认同危机。第五,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使用新的术语、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会话语言,使得一些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作品极为艰涩难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可取部分的传播和应用。

本文认为,一种较为切实的研究取向是将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传统主流理论联姻。理由是,各种理论范式都在强调一

个或几个研究视角,不可能全面解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综合性的、普遍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出现,人们更偏向于提出局部或次研究领域的专门理论。因此,在诸多理论范式并存的情况下,我们不一定要恪守某一种范式,而应该综合利用不同理论中的可取之处。尽管在某些方面和地方,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整体上讲,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对象。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关于国际体系模式、强调物质力量分配的研究取向仍然具有一定解释力。不过,这种仅仅是框架结构式的研究取向无法充分解释冷战后复杂变化的世界事务,因此需要充实内容,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则提供了社会、文化、历史等人文方面的研究视角。它们之间相互补充,有可能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研究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除了美国以外,还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这些分支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情况尚不明朗。因此,我们应关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深刻而复杂的转型过程,对整个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持冷静观察的态度。

(本文责任编辑 刘 绯)